□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邯郸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　何怀宏:《乱世与治思——兼论战国诸子对时代的反应》　指出战国末是一个乱世,不仅生灵涂炭,而且道德凌夷。当时的诸子对这时代有不同的反应,儒法两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理乱求治的思想理论,尤以韩非和荀子的思想最为彰显。荀子与韩非的政治理论同以一种性恶论和君主制的框架为基础,但荀子的性恶论却是一种努力“向善”而非“就恶”的性恶论,他比许多儒者更为强调人后天要大有作为、积极进取、且是朝着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的道德学识和品行的进取,而韩非不像荀子那样要积极鼓励人向善,反而是要尽量利用这种“恶”,通过赏罚来调动和管理人。他和韩非的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君主与官员阶层的关系,一个是君主与法律的关系。在荀子那里,有一种重视政治的道德基础,期望文教的复兴的儒家基本倾向,而在韩非那里,则主要是围绕加强君主的集中权力而展开。这后面反映了儒法两家不同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愿景。究竟怎样才能达到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历史看来最终选择了儒家。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2 期　任知言:《找回家庭——农民工家庭生活的实体化模式探究》　指出在全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半工半耕”成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的普遍家计模式。家庭是经济发展与情感互动的统一体。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厚的“家本位”价值观念,通过劳动力优化配置实现家庭积累的最大化在中国农民家庭中成为共识。对中国农民家庭来说,打工行为是他们“过日子”生活逻辑的具体形式。应将家庭作为实体带回到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之中,实现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间的情感互动。“夫妻工”模式的出现既满足了农民家庭实现家庭高积累的发展目标,也兼顾了夫妻间的情感互动,进一步增强了家庭的韧性,激发了家庭活力。

河南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2 期　姬建敏:《2023 年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主力分布与热点聚焦——基于编辑出版学 CSSCI 专业刊文献的分析》　指出 2023 年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形成了以核心作者为中心,以一流大学、重点研究机构为主体的研究队伍;研究热点包含数字出版、人工智能、国际传播、主题出版、融合出版等内容;核心议题是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媒体融合与数字出版研究、以主题出版为引领的对外传播研究、以学术期刊为代表的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等。未来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遵循,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下的编辑出版学理论实践和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3 期　汪青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法进路》　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新公司法回应时代需求最为集中的体现和依归。现代企业制度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四个基本特征,同时还需要把握先进性、时代性和国别性几个关键的内在维度。新公司法中国特色的增强主要表现在立法目的更加具有包容性、党的领导更加具有实质性、人民中心更加具有内涵性、法治企业更加具有适应性以及和谐共生更加具有操作性。未来仍然需要持续彰显公司法律制度演进的时代性、持续努力为公司企业组织输入社会性以及持续提升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协同性。

新疆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3 期　赵梦涵:《楼兰文书研究回顾与展望》　指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多位探险家来到新疆探险,攫取、带走了大量在楼兰古城遗址发掘的木简、残纸,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2000 年后,楼兰文书相关研究仍蓬勃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书法、历史学两方面。书法方面,学界不仅考察楼兰文书的艺术价值,更将其放置在书法史、汉字史的长时段内进行研究。历史学方面,学界注重研究楼兰文书中的“文书组”,注重研究楼兰文书与其他写本文献以及传世史籍、考古发掘间的关联。楼兰文书所展现的西域长史府的历史细节,汉晋间西域的交通情况等仍会是今后相关研究的热点所在。

北方论丛　2024 年第 2 期　杨梦宇、张晓校:《数字史学传播若干特征》　指出数字史学与数字文明相对应的是数字媒体社交传播,是与传统的纸质文本传播迥然不同的传播,体现出“交流+互动”的传播模式和特点。数字史学传播的对象——数据和信息,呈现的是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完全不同的数字文明社会的传播模式。非纸质数字史学载体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内贮存、传布,“分享”“共享”、互动等强化了数字史学传播过程中的广泛参与性、多样性特点,扩大了传播规模、范围,提高了传播质量和速度。多重媒体创造的平台,让数字史学的传播凸显了“媒体、平台、互动、参与”等一系列优势特色,历史学传播的内容、形式等无不透露出数字技术进步对史学进步的推动作用。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4 期　李涛:《国家荣誉制度创新发展的法理释义》　指出国家荣誉制度的实践逻辑主要

包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以及激发国家人才创造力的内在需求等。国家荣誉制度的本质是国家最高等级的奖励制度,是国家基于宪法规定、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行使权力的行为,法治原则确保了国家荣誉表彰的公正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积极构建并不断创新发展国家荣誉制度,不仅是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民族力量、引领时代道德风尚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彰显制度优势、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4 期　张红、梁诗童:《我国个人破产庭外程序的制度构建》　指出个人破产程序包括庭外程序和庭内程序,二者相辅相成。在我国个人破产的制度构造和司法实践中,庭内程序趋于完备,庭外程序有待完善。个人破产庭外程序的性质认定应当以民诉基本法理为依据,采取和解程序。为减轻司法压力,同时提高申请门槛,个人庭外程序宜采取和解前置主义,未经庭外和解不得进入庭内程序。我国个人破产庭外程序以债务咨询和债务人教育作为前置要件,并设立破产管理机构作为行政机构主导程序开展。个人破产庭外程序的开展分为申请、和解和履行三个阶段,破产事务管理机构应对每个阶段进行监督,确保庭外程序与庭内程序的有效衔接。

常州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1 期　周勇:《在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非均衡系统视角》　指出同富裕与发展内在联系紧密,非均衡发展强调差异性、特殊性,共同富裕强调共性、一致性。由非均衡发展达成广义的系统均衡或者动态均衡,构成了共同富裕是否能够实现的关键。在小系统、子系统内部,这些特殊性表现为小范围的共性。先在小范围内部开始推进共同富裕,再在大范围内拓展衔接;先在小系统内部实现共同富裕,再在更大系统、更高层级系统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当前阶段,应紧扣发展特殊性和富裕共同性矛盾,在共性基础上把握个性。切忌不区分发展类型,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以理想化的均衡模式推进脱离实际的共同富裕计划。

山东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2 期　王宁:《社会学如何把物质“请”出来?——以消费社会学中的“社会物质性”为例》　指出社会世界不但具有意义,而且也具有物质性,但社会学却变成了拉图尔所批评的“无物体的社会学”。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学家对陷入庸俗唯物论和技术决定论的担忧。随着数字技术革命时代技术产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学忽视物质性的局限愈发凸显。在拉图尔等学者的呼吁下,一些社会学家开始重视物质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但社会学家对于如何请出物质,依然还未达成共识。而重构吉登斯“结构与能动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切入口:把物质放入其中,就形成了“结构-物质-能动”的三角形关系理论。物质性和社会性的纠缠,形成了社会物质性。用“社会物质性”来解释某些社会现象,有时比用单纯的社会因素更具有解释力,这可以从消费社会学的实例中得到说明。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3 期　田俊武:《论旅行人类学》　指出需要消除学界对旅行的消费主义误读,从人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旅行的本体意义。作为一种地理的空间位移行为,旅行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从远古时代非洲智人的群体迁徙一直延续到当代的跨国流动。人类学意义上的旅行,不仅涵盖族群迁徙、地理探险、军事远征、商贾贸易、外事交往等各种空间位移行为,而且指涉人类在从事这些行为时的各种思想交锋和碰撞,由此体现出人类的现代性进程。因此,古典人类学认为,人类的核心进程就是旅行,对旅行的忘却就是人类自身的失忆。旅行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成为刺激文明发展的一个因素。

安徽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1 期　梁满仓:《荀彧曹操关系新论》　指出以往史家在评论荀彧时,常纠结于他是汉臣还是魏臣。当代史家即使跳出旧的窠臼,也把荀彧的政治立场分为两截:曹魏的功臣,汉室的忠臣。其实在这两截的表象之后,荀彧有始终如一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他的政治立场是挽救东汉王朝的衰败,使其免于崩溃;辅助汉朝去乱达治,使其起死回生。他虽然对曹操帮助巨大,但始终试图把曹操的政治发展纳入自己设计的轨道。曹操与荀彧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下,展开一场智慧的较量,较量最终以荀彧失败告终。荀彧的死,既意味着其政治诉求的失败,也证明了任何想借助别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都是徒劳的。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24 年第 5 期　韩淑梅:《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　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和生动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世界历史趋势和发展要求,以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范式上的赓续和内容上的拓新。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创造性运用和夯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和理论根基。